



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国际政府间活动
筹备委员会

第二届实质性会议

2001年2月12日至23日

欧洲区域发展筹资问题区域协商会议的报告，
2000年12月6日至7日，日内瓦

目录

| | 段次 | 页次 |
|-------------------------------|-------|----|
| 导言 | 1-15 | 2 |
| 一. 筹集金融资源促进转型和发展：国内方面 | 16-26 | 3 |
| 二. 官方援助在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方面的作用 | 27-38 | 4 |
| 三. 外国直接投资和转型和新型经济体的调整 | 39-48 | 6 |
| 四. 全球金融问题的区域观点 | 49-60 | 8 |
| 五. 结论 | 61-62 | 9 |
| 附件 | | |
| 一. 主席的摘要 | | 10 |
| 二. 会议日程 | | 12 |

导言

1. 欧洲区域发展筹资问题区域协商会议由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执行秘书，Danuta Hübner 女士主持开幕。她强调协商的主要目的是就如何吸引公共和私人资金流向转型经济体和如何有效利用它们来促进发展交换意见和经验。预期会议将就与管理全球一级的货币和金融系统有关的各项问题提出区域观点。她回顾到，这次会议是将于 2002 年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国际政府间活动的筹备过程的一部分。
2. 高级别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席，Jørgen Bøjer 先生（丹麦）被推选为会议主席。Bøjer 先生详细说明了高级别全球活动的筹备情况，他除了别的以外提到了其他区域委员会、联合国机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民间社会和商业界实体的参与情况。

会议的进行

3. 会议就五个与发展筹资的一般问题有关的特定主题举行了一系列小组讨论。
4. 本报告是根据小组讨论成员、成员国、非政府组织、和私营商业部门的代表所发表的意见和提出的建议编写的。它反映了区域内经验所取得的教训并提出了高级别活动筹备工作可能可以采纳的结论。以下不是欧洲经委会成员政府商定的案文，而是欧洲经委会秘书处编制的会议报告。主席的摘要载在附件一内，会议日程载在附件二内。

欧洲经委会转型经济体的转型和发展过程的筹资

5. 全体会议提出了某些重要的问题，在后来的工作会议中对它们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有人强调，欧洲的独特情况是各国之间在经济和发展水平上有巨大的差别。转型经济体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比西欧国家低得多，而且在转型国家本身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很大。这突出了与发展筹资有关的问题在欧洲的重要性。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大幅度减少东西欧之间的收入差距。但经验显示，赶上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需要这些经

济体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这就需要对实质和人力资本进行大量投资，而经费必须主要来自国内的资源。

6. 有人强调，许多转型经济体面临到基本上由于发展不足而引起的长期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实际人均收入平均水平非常低（按国际标准来衡量）、普遍贫穷、保健照顾系统不足、收入和社会差距不断扩大。而那些发展问题之外还有转型的问题，而在两者之外还有空前转型所引起的不景气以及区域内某些地方的许多冲突甚至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组合，使得这些经济体和它们的人民受到很大的压力和痛苦。

7. 西方捐助者注意到，经济发展及其筹资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而高级别会议的筹备过程因此是确定经济发展和减轻贫穷的关键因素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它们强调，国内因素，特别是旨在实现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进展的一贯改革政策，对于转型过程和一般的发展过程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必须把发展援助看做是国内努力的催化剂和推动/支助者。应该对旨在提高援助效率的各种措施，包括改进捐助国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的措施加以注意。有人强调，发达国家应作出努力，尽快达到将官方发展援助提高到它们的国内总产值的 0.7% 的水平。鉴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连带而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应使官方发展援助和债务减免能配合个别国家的具体需要和情况。还有人指出，加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市场准入是支助它们经济成长的基础。

战略

8. 会议指出，经济发展和赶上较发达的经济体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它取决于许多因素，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很难加以数量化。因此很难成功地模仿其他国家，譬如象爱尔兰那样的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一般而言，关键因素是国内的吸收能力，而这又取决于以下因素，诸如有效的体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结构改革、与国际分工的密切融合和人力资源的素质。

9. 会议还注意到，和谐一贯的改革政策是成功的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老”企业部门应受到严格的预算限制，应为成立新的公司，特别是中小企业建立有利的环境。

固定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10. 固定投资是技术改革的媒介，因此是转型经济体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经济结构的过程的核心部分。投资和经济成长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是很难确立的，最好把它们看成是互相加强的过程。有人关心，缺乏固定投资和令人失望的经济成长率可能会因为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造成技能退化或是因为人民向外移民而使转型经济体失去人力资本。

11. 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在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催化作用：它不仅是对外赤字融资的资金来源而且也是新技术和知识的来源。

国内和外部筹资

12. 会议指出，各转型经济体遇到的国外筹资问题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大部分国内投资几乎总是在国内筹资的。

13. 在最可能加入欧洲联盟（欧盟）的国家方面，主要的挑战是储蓄和投资间的不平衡状态。国内储蓄低（部分反映了人口因素）而投资需要却很高。这部分反映了需要在能源、环境和运输等领域内达到很高的共同标准。不过在這些国家里越来越能够取得（外国）私人资本，因而减少了对官方双边和多边援助的需要。

14. 相比之下，在比较不发达的转型经济体里，国内储蓄基础薄弱，金融媒介作用发展不足。政府的国内收入基础不足，使它们甚至不能履行它们基本的“守夜人”的职责。有私人资本流入，但范围有限。这些国家继续大量依赖官方援助，这种援助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应该是为公共基础结构项目提供经费。

官方援助的作用

15. 会议强调，西方的官方援助对于转型过程取得成功和为可持续经济发展过程建立基础是必不可少的。

但会议强调，官方援助只能是国内努力的补充。但西方捐助者应提醒自己，转型过程取得成功是符合它们本身的利益的，因为这将有助于确保整个欧洲实现长期经济和政治安定。这是马歇尔计划得到的教训之一，那个计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保西欧的经济复苏和政治安定作出了一个切合实际而有远见的评估。

一. 筹集金融资源促进转型和发展：国内方面

经济转型期间筹集国内资源的问题

16. 筹集国内资源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对于成长就是很重要的，因为推动这一成长的大部分国内投资的资金是国内产生的储蓄。今天情况仍然如此，但欧洲经委会东部的国家正面临到因经济转型而带来的非常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费用。尽管在 1990 年代后五年当中储蓄增加了，但在对投资的需求和区域内可以利用的内部资源之间似乎仍有巨大的差距。

储蓄——投资纽带和金融媒介不足

17. 会上有人报告，根据欧洲经委会秘书处最近作的一项研究在所有转型经济体内储蓄和投资率之间都存在着强大的连带关系。但在经济理论上，储蓄在经济成长中的作用并不明确。储蓄较高可以转化为更多的投资，而这又可以导致较高的成长，但较高的成长也可以刺激储蓄（反向因果关系）。无论如何，在大部分经济转型的国家里，人们一方面看到的高的储蓄和投资比，另一方面却看到经济成长率方面有相当大的差异。

18. 大部分与会者同意，缺乏体制或体制缺乏效力看来是国内储蓄不能有效转变为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管制架构薄弱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而这又反过来限制了调动国内储蓄的能力。银行部门管理不善也会阻碍投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可以对改进中间媒介作出重要贡献，但这需要对产权作出明确的规定。金融机构缺乏效力可能会导致家庭和公司缺乏信心，从而拉大金融差距。

19. 转型经济体发展金融制度和资本市场因此被认为是对调动私人储蓄十分重要的。有强烈证据显示，金融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将较多的储蓄转变成了投资。因此加速转型经济体的金融改革有可能刺激私人储蓄，并因此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如果有多余的储蓄但体制不足或缺乏体制，国际金融机构就应该介入，调动当地资金用于投资。

20. 此外，人们同意，宏观经济环境对于缩短财政差距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制订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提高储蓄率，协调一致的对外和国内政策也可以帮助将国内储蓄导向投资。

21. 还有些与会者关心，该区域的年龄结构对储蓄不利，即储蓄倾向不高的老年人比例不断在增加。这对社会保障会有重要的影响。随着人口的老化，政府用于养恤金的支出在国内总产值内所占比例将会增加。在其余情形相同的情况下，这将使国民储蓄率降低。还有证据显示，人在壮年的时候不会象生命周期假设所设想的那样进行储蓄。

中小企业的资金

22. 人们认为应该为中小企业的筹资确保一个有利的环境。外国银行贷款通常会用在比较有利可图的部门，而这通常不包括中小企业。尽管国际借贷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了支助，当地银行却因为缺乏体制、管理不善、或缺乏能力而没有对中小企业提供支助。尽管如此，中小企业在某些国家里仍十分兴旺，因为它们的大部分投资是自行筹措的。

公私伙伴关系

23. 政府和官方机构可以调动地方私人资源来为财政上可行的基础结构项目提供资金。直接的做法包括利用当地劳动力、调动其他当地资源、政府同私营部门分担风险、和利用当地的专业意见（法律、技术意见等）。

用于社会发展的收入

24. 有人关心，目前需要利用当地资源来进行经济改革，这可能会阻碍了区域内的社会发展；事实上，社

会问题必须与经济问题同时加以处理。社会发展被看成是一项对人的投资（对教育、保健和社会服务的投资），它不仅会改善社会的社会福利同时也会提高维持经济成长所需的人力资本。在西欧，国家、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都在提供社会福利，但在转型经济体里，国家的作用降低了，私营部门才刚刚出现（只提供那些付得起的人），而民间社会还无法承担起这项责任。

结论意见

25. 外来资金，例如外国直接投资，看来是刺激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可能反映出以下事实，即那是一种还会带来技术和新的组织方法的投资。但这方面的经验性研究仍十分有限，而现有的模型架构还不足以确定这些好处的大小或最可能导致它们的条件。

26. 但是，一般而言，可以预期，转型经济体将会遵循主要依赖它们的国内储蓄作为将来的发展和成长的主要资金来源的传统道路。因此国内政策必须在调动私人储蓄和投资方面发挥极重要的作用。

二. 官方援助在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方面的作用

27. 讨论焦点是，官方财政援助如何能够帮助转型经济体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在过去十年里这些经济体不时需要一方面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一方面进行系统和结构改革。这些工作需要相当多的资源，而在转型早期，它们通常无法从内部或从国外私人投资人那里调集到那些资源。曾试图从双边和多边机构，包括特别设立的、面向转型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来填补这一空缺。

28. 与会者同意，官方金融的全球供应量（特别是官方发展援助）是有限的，转型经济体的筹资需要不得越来越依靠私人来源来满足。事实上，由于许多转型经济体投资环境改善了，私营部门现在已经占到了流入资本的大部分。关于官方资金，有人一再指出，它们应当成为发展私营部门和调动私人资本的催化剂。若干来自转型经济体国家的代表团突出了官方援

助在转型过程初期的重要性，那些援助帮助它们达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让它们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除了提供迫切需要的资金外，与官方机构制订的安排有助于使投资界产生信心。但是，也有人强调，应当把官方援助看成是暂时的，长期而言，它不能取代国内调整、改革和推动当地储蓄。即使流入的官方资本增加了，仍预期国内储蓄将提供大部分的发展资源。

区域差异和对援助的持续需要

29. 一个主要的主题是转型国家间的差异和它们将来对官方援助的需要。这些巨大的差异反映在，除了别的以外，收入水平上（七个国家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减贫和成长安排的标准）、朝向稳定的进展上、经济改革的阶段上、和在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程度上。有一项共识认为，虽然一般而言对官方援助的需要减少了，但它在转型的过程中仍可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过，使它能配合各国不断变化的需要和各部门的发展仍然是一项挑战。

30. 随着各国的改革进入了更深入的阶段，它们的环境和财政需要也有了变化和演进。在收入中等、转型深入的经济体里，它们一般都已经成功地吸引到了各种私人资本，国际金融机构将继续促进系统的改革、为基础结构提供资金和帮助清理环境和培训等。应当铭记着，能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目前并不能保证酝酿时期长的项目一直能得到资金。在改革程度较低的国家里，仍需要比较大数量的较传统援助—以进行经济发展、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推行结构改革。

31. 各国政府提出了以下建议：

(a) 官方援助应该是从私营部门可以得到的任何资金之外的资源。公共资金不应取代私人资金；

(b) 官方援助不应撤销得太快，因为这可能危及其他国内方案；

(c) 国际金融机构仍应是提供紧急备用援助的可能来源；

(d) 一个代表团提议，发达国家履行它们的承诺，将它们的国内总产值的 0.7% 用来提供官方发展援助；

(e) 有人提议减免若干看来无法承受债务负担的低收入转型经济体的债务。

提供援助以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

32. 除了提供资源，人们一致同意以下提议，即国际金融机构应促进政策和长期市场改革，为可持续经济增长作好准备。人们提到了它们为基础设施提供经费的传统作用和它们积极的外在影响。不过，讨论的焦点是，官方资金提供的影响力应用来尽量扩大它的“过渡性影响”。为此目的可以使用的机制和政策包括审慎地应用各种条件、国际金融机构与私营部门密切相互作用、以及加强市场支助机构。特别是：

(a) 若干受援国政府指出了它们从各种条件（即国际金融资源所附带的条件）中所得到的好处。这些好处—从国际金融机构帮助制订政策和项目、技术援助、应用方案参数监测遵守情况等取得的好处—往往被认为同得到资金一样重要或更加重要；

(b) 国际金融机构应继续展开工作，改进银行、金融、法律和管制机构，但人们认为，查明和处理以往使得人们无法采取有效行动的重要政治障碍也是很重要的；

(c) 国际金融机构能通过让项目利用它的名称和同私营部门分担风险等做法来调动私人资金，这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资产。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在私营部门不愿意介入的项目、区域和国家里发挥带头作用；

(d) 国际金融机构参与项目可以为改进东道国的公司管理提供基础。

33. 受援国政府提出的另一个有利的承诺机制是加入前同欧盟进行的谈判过程。这被认为是结构改革的蓝图，它们认为这为进行结构调整和推行结构措施，例如私营化和取消管制以及提高它们的可持续性提

供了关键的动机。各种加入前方案是由各种欧盟基金和技术援助提供经费的。

34. 国际金融机构发挥了作用，通过贷款、产权参与和政策指导对发展中小企业提供了支助。除了在经济复苏中的关键作用外—某些发言者提到了这一点—中小企业在发展民间社会和开放市场方面的作用被认为是出现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系统所必不可少的。

35. 各国政府建议：

(a) 如果作出努力，使各项条件能配合各国的具体情况，那么条件的效果将可以进一步得到加强。在还没有实行的地方，捐助者和受援者之间最好能进行政策对话；

(b) 国际金融机构与其他官方捐助者应避免竞相放松条件，因为这很可能会导致人们迟迟不进行必要的改革，从而对受援国带来长期的负面后果；

(c) 捐助者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导致过分或未达到最佳标准的赠款因素，同时还会减少其他受援国能得到的援助；

(d) 应进一步探索公私伙伴关系，作为调动资金和分担风险的一种方法，但有些政府警告，它们并不是万灵丹。

协调援助和区域问题

36. 辩论中提出了若干同协调捐助者的援助和需要采取措施以扩大区域联系有关的问题

37. 虽然在协调捐助者的协助（多边和双边）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与会者认为应进一步予以改进。协调工作很困难，因为各捐助者有不同的目标、各捐助者对国家的需要有不同的评估、而且有各种不同的国家援助优先次序。但是与会者指出，缺乏援助管理方面的经验意味着，转型经济体在有效应用援助方面有时候会遇到困难。另一些与会者提请人们注意到以下事实，即发放援助方面往往出现拖延的情况。

38. 更有效的区域合作将可以对欧洲经委会区域内的某些地区带来好处。贸易和基础设施方面尤其如

此，因为在以前的经济系统下经济关系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的力量和竞争优势形成的。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大家同意，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采取这样一种新办法在许多东南欧国家里遇到了最新的挑战。

三. 外国直接投资和转型和新型经济体的调整

39. 外国直接投资被认为是消除转型经济体的筹资差距的主要资金来源。不过，流入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相对比较薄弱（除了少数例外），而且国家间差别很大。转型经济体内的外国直接投资不能更快速地增长的主要障碍是没有执行或未有力执行必要的政策（立法当局可能已经通过的政策）和国内行动者的反应不强（一个社会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的能力薄弱）。

40. 目前转型经济体内的情况显示出若干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形态及其影响：

(a) 过去十年里接受国累积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分配情况是相当分散的。就总数而言，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四个或五个转型经济体。如果把俄罗斯联邦包括在名单内，按人均外国直接投资计算，它几乎排在末尾。

(b) 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占转型经济体固定资本额的百分比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没有前项那么大，而且即使在最成功的国家里，它还不到全部资本额的10%，这表明，即使在那些国家里，外国直接投资也不是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

(c) 制造业部门人们看到的表现显示出，有外国参与的公司生产力较高，更面向出口，再投资率较高。也有强大的证据显示，在同一行业内，而且也在同一国家里，外国企业和当地企业的业绩差距日益扩大；

(d) 有时候对舆论产生不利影响的外国接管（特别是被跨国公司）的一个副作用是把独立的本国公司转变成了外国公司的附属公司，这意味着在决策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主权，进入了不同的竞争领域（主要是在多国公司的分销领域网络里）；

(e) 接受国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了若干种不同的政策。它们包括：私营化的方法（范围和条件）；国家待遇（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或非歧视性的）；可能偏向大投资者，因此偏向外国直接投资；和鼓励创业或向未开发地区投资。但是，转型经济体促进投资（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外国的）往往由于公共收入水平很低而遇到预算方面的限制。

41. 人们十分注意公共政策的问题，特别是同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问题。中心问题是，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哪种政策比较有效，尤其是，鼓励办法对于刺激内向投资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有任何作用的话。与会者一致同意，成功的关键是：(a) 一贯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b) 为商业投资提供一个大致有利的环境（不论是外国还是国内的投资）。旨在选择性地鼓励外国投资者的政策会扭曲经济，就长期社会福利而言，人们认为这不是一个有效的做法。

42. 转型经济体取得成功的例子大多来自设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不论就经济而言还是就政治而言），实施了一贯、透明和可预测的政策的国家。反过来，微观一级的成功例子则显示出了不同各级政府，一般、地方和市区政府间进行合作和保持一贯的政策的重要性。相反地，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犯罪、腐败、司法制度薄弱、基础结构不良的国家和区域吸引到的外国直接投资要少得多。

43. 某些西欧国家在促进以外国直接投资推动成长方面的经验对于转型经济体也很有启发性。譬如，爱尔兰的经验显示，一个国家可以做许多事情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不仅是由于它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容易进入一个较大市场（欧盟成员）、廉价而有技能的劳动力和税收方面的鼓励办法，而且也是由于它可以一贯地履行政策承诺（几十年来推行同样的政策），和通过有关的政策（例如教育和培训和发展必要的技能）来提供补充支助，使那些投资成为长期的投资。

44. 要提醒转型经济体的是，它们应当注意到，当地的企业并不一定有兴趣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因为这会增加它们面对的竞争压力。在公共施政薄弱的地方，这些利益集团可能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造成严重障碍。当地公司达成联合协定反对有外国参与的公司某些国家里也十分常见。

45. 想要成为欧盟成员的转型经济体必须逐步使它们与投资有关的政策与欧盟的政策调和。后者禁止对外国投资者给予特别优惠，或给予任何商业集团优惠。因此，有些国家里的特别鼓励办法（例如免税区、免税假日等）必须逐步取消。

46. 讨论中有人指出，大部分的注意焦点是在接受国的政策上，对来源国的外向投资的有关政策的辩论要少得多：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也可能造成扭曲。有人认为，在这方面有需要进行更多的合作和交流信息，以期更加划一与和谐。

47. 国际上商定的有关贸易的政策和规则，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范围内，也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就严格同投资的流入和流出有关的政策而言，进展有限。在由世贸组织带领的谈判的范围内，在过去三年里曾有人试图统一适用于外国直接投资（在某个程度内适用于外国代理人进行的证券投资）的国际规则，关于部分涉及与外国投资有关的服务业贸易，已经有了一些国际商定的规则。

48. 会议当中辩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外国直接投资延伸出来的影响和它的反向联系。有人指出，这些延伸出来的影响普遍被认为是正面的（散播新的技术、知识、管理技能），但有些与会者强调，那些影响也可能是负面的（出现双重经济，一小块生产力高的地区，四周围绕着尚未改革的经济部门）。政策应尽量扩大积极的延伸影响，尽量减少消极的影响。与会者认为，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应作出更多的努力，使各国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关之间保持经常对话，并积极散播关于最佳做法和成功的例子的信息。有人建议，在高级别会议的筹备阶段应让商业界加入讨论，并邀请它们参与进来。

四. 全球金融问题的区域观点

49. 调动稀缺的金融资源——将国际资本导向最具有生产力的用途——所带来的好处已经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提高了世界所有区域的生活水平。

50. 在最近亚洲和俄罗斯联邦发生的金融危机业显示出，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必然是不稳定的，可以触发严重的金融（银行、货币、债务）危机，从而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由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非常依赖外国资本，它们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流动过于动荡不安的伤害。减轻和防止这种金融危机的各种努力因此应成为政策议程上的首要项目。由于这种危机反映出了政策失败和市场失败两者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更加迫切需要作出这样的努力。

51. 虽然对于将来的国际金融结构尚未普遍达成协议，人们一般都接受，国内政策的执行者负有明确的责任，为市场的良好运行建立起健全的法律和管制架构。国际的改革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但它们不能取代健全的国内经济政策。

守则和标准

52. 改进有关主要宏观经济变数的资料的质量和及时性和有关金融和非金融公司提出报告的守则和标准被认为是贷方和投资者能作出更理性的决策的必要条件。有人指出，象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数据发布标准可以帮助各国的中央银行确定数据方面的需要。更大的透明度应该也可以让市场发挥作用使决策人员更有纪律，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监测作用。这方面的进展并不均衡。有人指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财务报告方面的进展比公营部门内的进展少。不过有人强调，全球标准和守则不应成为束缚，而应是广泛的准则，其中考虑到各国在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方面各不相同。

金融管制和监督

53. 加强和调整金融部门的工作如果没有和谐的国家管制框架是不可能成功的。管制方面的改革因此是减少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如果发生时，限制它

们的不利影响的必要条件。还有人强调，国家管制当局，特别是在数据交换领域内的协调仍需改进。人们一致认为，世界管制机构（世界金融管理局）在实施全球标准方面不可能比国家当局协调一致的努力更为有效。

条件性

54. 国际金融机构援助的最主要原则，包括财政方面的原则必须是“由国家所有权”。条件性是减让性贷款的一个根本部分，但必须从各国国内经济主要基本情况来审查条件的性质，而那些基本情况将因国而异。有人指出，条件是私人投资者和借贷者的一个重要指标。

资本帐户自由化

55. 人们确认，短期资本流动方面的“繁荣萧条循环”可能会对转型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宏观经济管理和财政监督造成严重问题。有人建议，可能必须对私人短期资本的流动进行控制，以减少金融系统的过度动荡并从而确保更大的稳定性。这样的控制应该是以市场为根据的工具（例如税收、最低储备方面的要求），最好被当作是对管制改革和监督以及对提高政府、金融机构和私营企业的活动的透明度的补充。

56. 有些与会者相信，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采取控制资本的措施；其他人认为它们是金融系统脆弱的经济体所必不可少的。无论如何，资本帐户只有在采取了一系列审慎的经济改革措施和加强了国内金融机构之后才应自由化。

汇率安排

57. 与会者普遍认为，不能脱离根本的资本帐户制度，独立地讨论汇率制度。任何有关汇率制度的建议都必须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由于各国经济条件不同，各国的适当制度也将是不同的。

58. 在汇率自由浮动和严格固定汇率这两个极端之间有许多中间的解决办法可能适合个别国家的特殊情况。

59. 有人指出，汇率自由浮动的不稳定性在发生重大失调的时候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宏观经济代价。在各组成经济体之间互相的贸易联系比较强大的区域里，旨在限制汇率浮动的安排（例如西欧的汇率机制）可能是有用的，但这也需要制订政策，促进成员间真正缩小差异。

60. 有人还建议，选择特定汇率和资本帐户制度不要成为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的一部分。

五. 结论

61. 在闭幕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他的结论，后来他向各成员国分发了他的结论（见下面附件一内主席的摘要）。各工作会议的主席简短地报告了关于他们各自主题的讨论情况，如上面说明的那样。欧洲经委会执行秘书致了闭幕词，其中她强调，欧洲经委会区域内的转型经济体在处理它们的发展筹资问题方面已经累积了十年的经验，这次会议让人们有机会吸取成功的经验，并从错误中记取教训。

62. 在她结论认为获得一致同意的许多问题中包括应该调动国内资源来进行发展，以及应该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来支助国家的努力。她一再强调有效机构

的关键作用，以及应该执行各项商定的规则和政策。她强调所有各种形式的资金应是互补的，她虽然同意私人投资的重要性，但也强调了公共资金仍可继续发挥催化的作用。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需要面对转型的社会代价，这不仅要以社会正义为根据，并且还要避免引起社会不满，从而破坏了转型过程本身。显然必须减少政府对缺乏效率的企业提供没有生产力的补助的开支，从中释放出来的资源可以有效地用来支持目标明确的社会开支。强调了地方一级在发展筹资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可以把国家下放权力的改革看成是促进地方社区更多地参与区域发展项目的催化剂。必须产生出新的有创意的筹资形式这一点也受到了强调。得到人们同意的另一点是，需要有更密切的区域和分区域合作，以此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好的利用。人们确认了条件性的积极作用，但人们强调，捐助者和受援者应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最终把条件转变为有效的伙伴关系。执行秘书还突出了欧洲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一点，因此所有有关的行动者，从政府到私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之间都有需要建立伙伴关系，并应就所有影响到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題保持对话。从这个角度看来，会议作出了建设性的重大贡献。

附件一

主席的摘要

欧洲经委会成员国和国际清算银行、欧洲共同体、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和若干商业银行、私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于 2000 年 12 月 6 日和 7 日在日内瓦集会,按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国际政府间活动筹备委员会的要求,举行了区域协商会议,以期:

(a) 就转型经济体如何吸引外国和本国公共和私人金融资源并利用它们来从事发展交换意见和经验;

(b) 突出高级别活动全面实质性筹备过程可以有效利用的教训和结论,以及分享他们关于发展筹资问题全球方面的意见和想法,并从而对促进全面发展筹资过程作出贡献。

与会者注意到,他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2000 年 9 月 8 日的《千年宣言》(大会第 55/2 号决议)内表示决心除了别的以外,在国家一级和全球一级创造一种有助于发展和消除贫穷的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在筹集资助其发展所需的资源时面临各种障碍表示关切;他们的政府因此承诺将竭尽全力确保高级别活动圆满成功。

人们确认到,欧洲经委会区域拥有广大而多样的经验,特别是过去 10 年来,但也从战后重建的年代里,发展筹资过程仍用得着那些经验。这些经验突出了个别国家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一在处理它们的情况时也需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这些经验还显示出,发展战略广泛为地方所有是发展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

人们认为,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扩大管理,制订有利于储蓄和投资,包括外国投资的国内政策和管制框架上,这对于成长和改善社会状况是很重要的。在此方面,许多人认为国际金融机构的调整安排中所载各项意见是很重要的。人们普遍同意绝对应该支持各国发展使市场经济能良好运作所必需的能力和体制,包

括发展能力,确保发展成果的社会公平分配,从而使发展在人和社会方面成为可持续的。

人们认为公司的管理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领域,发展国内金融部门也是如此。此外,人们认为中小企业在维持和扩大成长方面,在为改革提供有利的经济环境和支持者方面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把非正规部门的知识、创新精神和资本带入发展的主流也是必不可少的。

整个会议中都在强调区域合作是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能够进入全球经济和刺激外国直接投资的关键,是促进和平、防止冲突和重建的决定性因素。《稳定公约》旨在帮助东南欧国家处理战争的影响和建设和平与重建的需要,若干与会者强调它是区域合作的一个例子,但有人强调在它之前已经有许多其他区域合作的例子,例如中欧机构。

人们普遍同意,一个更开放和更容易进入的贸易环境,让最不发达国家能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的贸易环境是把它们纳入国际贸易系统,使它们的扫除贫穷的努力取得成功的关键。

人们同意,应作出更大的努力,防止金融动荡和危机。对于资本帐户自由化和选择货币制度的正确做法似乎出现了一种比较不僵硬的认识。进入资本市场是长期发展的关键。不过必须确认到,市场是起伏不定的,因此进入该市场也是无法保证的。

筹集更多资源和更有效的合作是实现国际社会所赞同的国际发展目标的关键。人们普遍同意,为达到该目标,各发展伙伴之间,例如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区域开发银行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它是发展筹资过程的基本——它们之间需要进行更真的合作。会议提请人们注意到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其他机构采取的参与性做法的特殊价值。有人提到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综合发展框

架和减贫战略文件是旨在促进合作精神的及时而恰当的工具。

不过合作必须尊重处境、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多样性。许多与会者指出应对发展合作采取一种适当配合和逐步实施的办法。若干代表还强调外来伙伴应继续参与，不要过早从那些国家撤出，因为那样做可能会使成果功亏一篑。但从较长期的角度来看，援助应该是一种过渡的现象。随着那些国家取得了发展，它们自己将会成为较不发达国家的支助提供者。

人们确认到，官方发展援助仍然是发展资金方面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承诺拨出国内生产总值的 0.7% 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捐助国代表重申了它们将尽快达到这一指标的承诺。官方发展援助是国家资源之外的补充。人们普遍认为官方发展援助应对筹集私人资源，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发挥催化作用。选择性也被认为是有效援助的一个先决条件，与会者提到的选择标准有政策的质量、推动改变的可能性和是否能从其他来源得到资金。

及时执行重债穷国倡议是使有关国家能够挪出充分的资源从事减贫工作和投资社会部门的根本要素。

关于中收入国家，人们发现，最好把力量集中在低于贫穷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仍然很高的国家。

发展筹资过程不应该仅仅是为发展筹集资源的一个过程，也应该是对 1990 年代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各次联合国会议所拟定的各项目标进行检讨的一个机会。

与会者认为发展筹资过程和高级别活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国际社会能对若干发展和减贫的根本因素获得更多的了解。人们认为它是针对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上政策和行动者都必须有更大的一致性而提出的，也是一种综合的办法，考虑到了所有的政策，特别是融资和贸易方面的政策。

发展筹资过程有可能发展出协调一致的领导作用，促使人们在公平和参与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人的和社会的发展。

把所有主要的行动者和利害攸关者联合起来，共同分析如何为发展筹措资金，由此产生的共同目标和方向感可以成为强大而持续的动力，推动政治和经济行动，让所有人参与，让所有人都获益。

附件二

会议¹日程

2000年12月6日，星期三

第十九会议室

10.00-13.00 全体会议开幕：为欧洲经委会转型经济体的转型和发展过程筹资：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致欢迎词： Danuta Hübner，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欧洲经委会）执行
秘书

本会议主席²： Jørgen Bøjer，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国际政府间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席

小组讨论： Ignacio Garrido，欧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副总裁

Lambe Arnaudov，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副经济部长

Willem Buiters，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者

Danuta Hübner，联合国欧洲经委会执行秘书

Harald Kreid，联合国欧洲经委会主席

Marcelo Selowsky，世界银行欧洲和中亚区域首席经济学者

Michael Tutty，欧洲投资银行副总裁

Alexei Ulyukhaev，俄罗斯联邦，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会议一和二（平行举行）

第二十三会议室

特别会议一：为转型和发展筹集财政资源
国内方面

本会议主席³： Armen Martirosian，亚美尼亚副外交部长

¹ 按联合国大会规定，本区域政府间会议是为筹备定于2001年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政府间活动而举行的。

² 被提名和推选为大会的主席。

³ 被提名和推选为大会副主席。

介绍性发言者: Peter ÁkosBod, 匈牙利布达佩斯经济大学教授, 前匈牙利国家银行总裁

讨论带领者: Winfried Braumann, 奥地利 FGC 执行主任

Christopher Clement-Davis, 欧洲经委会, 建设-经营-转让小组

Rumen Dorbinsky, 欧洲经委会, 经济分析司, 转型经济科代理科长

Arif Erden, 土耳其, 财政部, 对外经济关系司副司长

Robert Hall, 欧洲经委会房地产咨询小组主席

Velimir Rajkovic, 克罗地亚助理财政部长

Nigel Tarling, 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方案主任

Adalbert Winkler, 德国金融部门发展咨商公司首席经济学者

OlexanderS.Yaremenko, 乌克兰, 总理顾问

第二十五会议室

特别会议二: 官方发展援助在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方面的作用

本会议主席³: Cristian Popa, 罗马尼亚国家银行副总裁

介绍性发言者: Marie Lavigen, 法国, Pau 大学教授

讨论带领者: Manuel Pedro Baganha, 葡萄牙财政国务秘书

Urs Breiter, 瑞士外交部, 瑞士发展与合作局, 与东欧和独联体合作司, 部长, 副司长

Christopher Hurst, 欧洲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者部, 司长

Hans Peter Lankes, 欧洲复兴开发银, 转型战略主任

Bertrand de Largentaye, 欧洲联盟委员会, 对外关系部, 主任

Krzysztof Ners, 波兰, 副财政部长

Marcelo Selowsky, 世界银行, 欧洲和中亚区域首席经济学者

Emirlan Toromyzaev, 吉尔吉斯斯坦, 第一副财政部长

Roberts Zile, 拉托维亚, 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特别工作部长

2000年12月7日，星期四

10.00-13.00 特别会议三和四（平行举行）

第二十三会议室

特别会议三：外国直接投资和转型和新兴经济体的改革

本会议主席³：Krzysztof Ners，波兰副财政部长

介绍性发言者：Gabor Hunya，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

讨论带领人：Rolf Alter，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Investment Compact Project Team of the Stability Pact 共同主席

Richard Eglin，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和金融司司长

John Fitzgerald，都柏林，经济和社会研究所，研究教授

Jonathan Harris，联合王国，Royal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urveyors 主席

Eugenijus Maldeikis，立陶宛，经济部长

Aleksei Moiseichikov，白俄罗斯，特别大使

Signe Ratso，爱沙尼亚，经济事务部，副秘书长

Karl Sauvant，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投资技术和企业发展司，国际投资、跨国和技术流动处处长

Joseph Smolik，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经济分析司，国际经济关系科科长

Vassili N. Takas，希腊，东南欧合作倡议商业咨询委员会共同主席

Ralf Zeppernick，德国，经济部，对外贸易司司长

第二十五会议室

特别会议四：从区域观点看全球金融问题

本会议主席³：David Klein，以色列中央银行总裁

介绍性发言者: Yilmaz Akyüz,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 代理司长

讨论带领人: Gunter Baer, 国际清算银行秘书长

Andrew Cornfor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处

Daniel Daianu, 罗马尼亚前财政部长, 罗马尼亚欧安组织经济论坛国家协调人

Heiner Flassbeck,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处; 德国前副财政部长

Reinhard Munzber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联合国特别代表

Mosmir Mrak,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 经济学教授

Muravei Radev, 保加利亚, 财政部长

Alexei Ulyukaev, 俄罗斯联邦, 第一副财政部长

第十九会议室

全体会议闭幕
15.00–18.00

本会议主席³: Jørgen Bøjer, 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国际政府间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席

特别会议的报告:

特别会议一 Armen Martirosian, 亚美尼亚副外交部长

特别会议二 Cristian Popa, 罗马尼亚国家银行副总裁

特别会议三 Krzysztof Ners, 波兰副财政部长

特别会议四 David Klein, 以色列中央银行总裁

最后讨论

闭幕词 Jørgen Bøjer, 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国际政府间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席

Danuta Hübner,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Harold Kreid,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主席

